

# 文化印记

## 百年小院梅兰芳祖居首次开放 触摸京剧大师的戏里戏外

前不久,位于北京铁树斜街上的梅兰芳祖居焕新重生,首次开放。这座百年小院变身“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为走进胡同的年轻人,带来可观、可触的艺术之旅,成为人们了解梅派技艺,感受京剧文化的又一处沉浸式体验空间。

### 咸、同年间 梅家在京城便“享名独优”

跟随北京文史学者方继孝,我们走进这座闹中取静的小院,徜徉在陈列着梅兰芳经典舞台形象、舞台道具的展馆中,追溯从这里开始的梅派技艺与传承。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二十四日,梅兰芳诞生于北京铁树斜街(今铁树斜街101号),这个宅院是他的祖父梅巧玲在清同治年间购置的“景和堂”房产,门楣题有“门庭香且宝,家道泰而昌”隶书对联,遒劲有力。

中国有句老话:“三年出一个状元,三年却出不了一个戏子。”可以想见,艺术人才造就之难。梅家自祖父梅巧玲、伯父梅雨田、父亲梅竹芬,直至梅兰芳,及至他的后人梅葆玖、梅葆玥,剧艺四代相传,成为梨园翘楚。

在晚清咸、同年间,梅家在北京城便有了“享名独优”的声名。祖父梅巧玲当时便以演活泼的青年女子出名,在《渡银河》戏里,演“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杨太真,能使全场意趣盎然。梅巧玲原为昆旦,且能吹昆曲笛子三百套之多,但为时势所趋,他改业皮黄,成了京戏开山之一。到了梅雨田手里,胡琴的情形就不同了,以前简单的过门,花样变多了,二黄原板、西皮慢板、反二黄等优美的过门,几乎都是梅雨田改良出来的,成为“梅派胡琴”的祖师爷。

梅兰芳先生才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年之后,母亲又去世了。他从小便孤苦伶仃,所以他说过:“世上的天伦之乐,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梅巧玲重侠好义,不惜巨金去接济那些为他捧场的寒士和同行失业的伙伴。他虽然做了四喜班头,去世时余资也不多。梅兰芳幸好有祖母躬身抚养,七岁开始跟有“胡琴圣手”称号的伯父学戏,所以他未到十岁,耳濡目染已会唱唱亦三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了。

虽然童年时代家境非常贫困,梅兰芳天生丽质,又极聪明上进,自12岁取艺名兰芳,在北京登台以后,雏凤清音,一鸣惊人。

### 一幅《麻姑献寿图》启发梅先生创造古装戏

梅先生幼年学戏的启蒙老师是吴菱仙老先生。路玉珊老先生也曾跟他说过刀马旦,茹莱卿先生跟他说过把子。王福卿、陈德是检场的,他们的建议梅先生也都虚心接受,诚恳学习。

梅兰芳这个名字,在戏剧史上堪称不朽。但梅先生从不以名演员傲视一切,他对任何剧种的戏都是细心观摩研究。如有人说:“梅先生你那个身段表演得不好看。”他一定要说:“依你的意见怎样好哩?”提意见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及至第二次再演时,梅先生一定要把经过研究的新动作带上舞台,如果反映好就充实到自己表演里去;反映不好或者不如第一次,他会再跟提意见的人反复磋商研究。当时剧团的人受到他良好品德的影响,人与人之间没有纠纷,也很少发生争执,艺术上的合作氛围非常和谐。

在一次寿宴上,一幅《麻姑献寿图》引起了梅先生的兴趣,他认为古装很美,就仔细地研究,按照图上的样子设计了服装。他还在家里将一张八仙桌子放在院子里,然后穿上古装在桌上做各种身段姿态,让大家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很好。继之以后,梅先生又研究创作了盘舞、羽舞、剑舞、袖舞,自此古装便盛行于京剧舞台上。

梅先生亦擅诗词,常与友人唱和,还喜欢即兴写诗。方继孝坦言,梅先生画作传世有限,他家藏有梅先生1932年(壬申孟冬)绘花鸟一幅,1947年(丁亥秋月)绘蔬果图一帧,上有诗云:“西风吹动锦斓斑,晓起窥园露未干。三月宿醒醒不得,正思风味到辛盘。”此外,方先生还收藏有梅先生赠“烤肉季”诗的钢笔底稿,以及晚年为印度诗人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所作怀旧诗稿手迹。从中可见,梅先生书画,都有很高艺术造诣。



梅兰芳祖居。

梅先生第一出创造性的新戏是《牢狱鸳鸯》,接下来是《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跟着在唱腔上也逐渐有了创造。当时是王瑶卿老先生帮助他研究,后来是他的琴师徐兰沅先生和王少卿先生一起,如二本《西施》、《洛神》、《廉锦枫》、《三娘教子》、《宇宙锋》、《春灯谜》、四本《太真外传》、《生死恨》,这些戏的唱腔与曲牌的编排都是梅先生与二位先生研究创作的。

### 试了很多乐器 将二胡正式搬上舞台

梅先生在唱功上有极深的修养,他的嗓子清脆犹如山涧清泉,出谷黄莺,凡一句唱腔的起落以及行腔都严格讲求自然大方不做作,一字一音丝毫不苟。由于他行腔有分寸,该行则行,不行行则不行,唱一句,行一腔都是经过仔细揣摩,因此人们赞誉说“梅先生唱戏,从无歪腔邪调”。

在表演上,梅先生最大的优点是人物性格刻画深刻,能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身世的共鸣。他演《黛玉葬花》,忧伤的神情加上悲凉的反二黄慢板,一个多愁善感、身世飘零的林黛玉被演绎得栩栩如生。他演《闹学》同样使人敬佩,如昆腔戏《春香闹学》,他能很巧妙地塑造出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

京剧表演技巧讲究台步要方正,每一步都要节奏分明。梅先生这方面真是炉火纯青,他的“圆活”动作美极了,同时他的头、腿、眼、足都是跟着手的动作,不乱,要圆即圆,要方则方,随心所欲,顺畅自然。

梅先生在表达人物内心感情的表演上也高超得很,比如他在《宝莲灯》里唱慢板时,过门的时间很长,虽是静止地立在舞台上,但是观众觉得人物有着内在的激动,不是呆立在那儿。方继孝先生印象很深,梅兰芳与姜妙香演的《奇双会》,把一夫双妇的闹房之乐,演得惟妙惟肖,但却没有一点庸俗之气,是难以企及的表演。

梅兰芳先生对京剧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二胡正式搬上京剧舞台,成为伴奏青衣唱腔必不可少的乐器。据徐兰沅先生回忆,1923年,他们在北京排新戏《西施》,梅先生感到音乐伴奏单薄,就和徐先生商量,用了很多乐器试听,首先是四胡,然后用大忽雷小忽雷试,觉得很乱,最后用最普通的二胡来试,大家一听之下,都觉得音色圆滑,京剧衬托以后更好听了,因此就决定用二胡。

当第一次二胡伴着京胡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观众觉得很新鲜,一段时间以后,人们的耳音已适应,就更喜爱了。发展到今天,二胡成为青衣唱腔必不可少的伴奏乐器,在京剧音乐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 “临场借扇子”的故事广为流传

值得提及的是,在戏外,梅先生也具有常人不能比拟的修养和品德。

“梅先生临场借扇子”的故事在戏剧界广为流传。一次,梅兰芳先生演《贵妃醉酒》,临上场时,管服装道具的人找不到杨贵妃手里拿的那把扇子,急得满头是汗,直打自己的嘴巴。梅先生心里也急,但仍平声静气地安慰他:“别着急,找找看。”这时梅先生已走到上场门边,一声“摆驾”已念出,扇子仍未找到。他灵机一动,顺手把身边一位朋友正在扇着的扇子拿过来,稳步登台,把这戏从从容容演了下来。

梅先生擅丹青,从王梦白为师,又常和陈师曾、汤定之、齐白石、姚茫父、金拱北相互切磋。上世纪20年代,齐白石的画在北京尚遭冷遇,当时已有“伶界大王”之称的梅兰芳却独具慧眼,推重齐白石的画,经常向齐白石请教,二人友谊逐日加深。一天,梅兰芳约请齐白石先生到自己的住宅玉轩轩叙谈,在座的还有戏剧界的朋友,大家一起谈论艺术,气氛极为融洽。梅兰芳请齐白石画草虫以便观摩。梅兰芳亲自用纸打磨,齐白石欣然提笔,所画草虫栩栩如生。画刚完成,梅兰芳歌喉婉转,相报一曲,声清韵冷,使人感叹。第二天,齐白石写了首绝句赠给梅兰芳,其中一首是:“飞上十丈晴窗,缀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作画,殷勤磨墨就三升。”

梅先生亦擅诗词,常与友人唱和,还喜欢即兴写诗。方继孝坦言,梅先生画作传世有限,他家藏有梅先生1932年(壬申孟冬)绘花鸟一幅,1947年(丁亥秋月)绘蔬果图一帧,上有诗云:“西风吹动锦斓斑,晓起窥园露未干。三月宿醒醒不得,正思风味到辛盘。”此外,方先生还收藏有梅先生赠“烤肉季”诗的钢笔底稿,以及晚年为印度诗人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所作怀旧诗稿手迹。从中可见,梅先生书画,都有很高艺术造诣。

李喆



“和刻本”《一切经音义》。



明代刻本《三国志》。

# 77年,涵芬楼珍贵古籍首次公开亮相

商务印书馆古籍库复名“涵芬楼”,77年来首次向公众呈现馆藏珍贵古籍。今年2月11日是商务印书馆建馆129周年的日子,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带领读者云游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商务印书馆融合出版基地内的英语编辑室、《英语世界》杂志社、万邦同和、涵芬楼文化公司、万有知典等多个部门和子公司,介绍珍贵古籍背后的故事。

### 重建涵芬楼再续百年传统

“重建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件大事。”顾青说,这既是对馆藏古籍的更好保护,也是对商务印书馆文化传统的延续。

“区所得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为善本,别辟数椽以贮之,颜曰涵芬楼。”涵芬楼创办人张元济曾在《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言中如此写道。据介绍,历史上的涵芬楼,单是善本和珍贵稿抄本就达37000多卷,其中包括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21册,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藏书楼。“涵芬就是涵养书香。”站在张元济书写的“涵芬楼”牌匾前,顾青感慨万千,“涵芬楼作为一个藏书楼,收集、保存和利用中国的各类图书和古籍,而收藏图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设立图书室,为编辑出版搜集参考资料。随着藏书规模的不断扩大,1910年初图书室正式命名为涵芬楼。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涵芬楼藏书基础上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该馆成为当时远东地区收藏最富、品质最高的公共图书馆。馆内三层设古籍善本室,延续涵芬楼之名。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毁于战火,此后近百年,涵芬楼未再以独立空间重现。

直至2025年,商务印书馆融合出版基地在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启用,在三层设立古籍库,重

以涵芬楼命名,并将张元济手书“涵芬楼”制成匾额悬挂其外。“涵芬楼在编译所是三层,后来在东方图书馆也是三层,到现在我们建立了新的商务印书馆大楼,也在三层重建涵芬楼,把我们的古籍珍藏在这。”顾青说,“涵芬书香”的深刻内涵,也体现在今日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库之中。

### 明代刻本《三国志》为一大亮点

“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涵芬楼首次呈现在公众面前。”顾青说。走进涵芬楼,书柜整齐排列,善本古籍受到精心保存。顾青小心打开书柜,展示《涵芬楼烬余书录》。该书由张元济先生编纂,详细记录了“一·二八”战火中遗存的善本古籍。新中国成立之初,商务印书馆将这些遗存的善本古籍捐赠给国家,这份目录在馆内保存至今。而如今涵芬楼中珍藏的古籍和线装书,总量已超过3万册。

顾青还特别展示了张元济先生主持整理出版的《四部丛刊》,函套装的《四部丛刊》历经岁月沉淀,愈发古朴典雅。在古籍库众多馆藏中,《三国志》与《一切经音义》更显珍贵。

顾青介绍,馆藏的《三国志》是明代南京国子监万历二十四年的刊刻版本,作为明代官方刻书机构的精品之作,这部古籍的珍贵之处首先在于它的书板渊源。刻书所用的书板从宋代流传而

来,历经元、明两代多次修复沿用,是难得的古代官刻善本。更难得的是,这部书还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何焯的亲笔批校本,书页上留有其朱墨批注,并为清代名臣刘墉,也是人们俗称的“刘罗锅”旧藏。集珍贵版本、名家批注、名人收藏于一身,这部古籍更具历史与文献价值。

另一部古籍《一切经音义》由唐代高僧慧琳编纂,全书共100卷,详细注解了唐代传入中国的佛经中各类词汇的读音与含义,堪称唐代的“佛经大辞典”。涵芬楼馆藏的这部古籍属于“和刻本”,是古代日本人仿照中国刻书技艺刻的汉文古籍,存世量稀少,价值珍贵。

“在晚清之前,近一千年的时间,中国的知识界根本不知道有这部书。”顾青讲述了《一切经音义》跨越千年的流传与回归历程。这部典籍在唐代编成后,几经流转传入辽国,后又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就此在国内湮没无闻。直到晚清时期,学者丁福保赴日访书时偶然发现了这部著作,将其带回国内,这部失传千年的珍贵古籍才得以在国内重新刊行,重回中国学界的视野。

### 古籍保护要追求“片纸不丢”

商务印书馆作为百年文化阵地,又经历过战火的“灭顶之灾”,对古籍保护格外重视。顾青因此多次提到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善

本古籍是不可复制的,所以用最好的环境把它们保存下来是最重要的。”他介绍,为了守护这些珍贵古籍,涵芬楼古籍库配备了恒温恒湿系统和专业保护设备,为古籍保存提供稳定条件。

在顾青看来,古籍保护“第一要抢救”,要有保存古籍的意识,追求“片纸不丢”。同时,他也希望让更多公众了解古籍保护的意義。“中国古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意识,带字的古书要好好保存下来。”

涵芬楼珍藏的善本书目还在逐步整理的过程中。在商务印书馆古籍库工作间,工作人员说:“目前已经登记在册的有3万余册,正在整理的大部分为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书。”

工作台上,摆着早已泛黄的《金文历朔疏证》《戊戌六君子遗集》《本草汇编》等,其中,《戊戌六君子遗集》由张元济先生编辑,出版于1918年。“还有这本《金文历朔疏证》是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印刷发行人为王云五。”工作人员介绍,整理这些书籍,首先要小心翼翼地拆掉原先绑在上面的麻绳,清理一下灰尘,再根据类别进行清点后依次放入书柜里。

正在整理的还包括一些名人捐赠的古籍,如刘诵先生捐赠的《乐府诗集》等。顾青表示,整理旧藏是个浩大的工程,商务印书馆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路艳霞



部分入选《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书影。

高,搜集工作刻不容缓。”甘新坦言,面对挑战,广西探索出“复制件换原件”等创新模式,尊重民间情感与使用习惯,使珍本“回家”之路愈加顺畅,抢救数量持续增长。

在把古籍“救回来”的同时,广西更致力于让古籍“活起来”。近年来,广西古籍存藏环境持续改善,古籍数字化建设不断推进,在活化利用方面成果尤其显著。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相继举办了“珠还合浦功业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广西巡展、“殷契刻天下 汉简读中国——殷墟甲骨与居延汉简展”“钟灵毓秀 桂生于斯——典籍中的八桂文化展”等大型精品展览,开展“《百部经典》课程进校园”“中华古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广西行”等活动,持续加大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力度。

广西博物馆则推出了首个古籍专题陈列“万卷·书生——馆藏古籍陈列”,通过定期更新主题,

向社会公众提供持续而深入的古籍文化展示。同时,该馆与高校携手,通过开展古籍装帧体验等活动,邀请年轻一代亲手触摸历史,参与传承。

“《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的公布,意味着八桂大地在构建古籍分级保护机制方面实现了重要跨越,不仅为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提供了扎实的资源基础,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深沉而持久的人文内蕴。”广西博物馆古籍库管理员张弛说。

广西古籍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广西将以第四批珍贵古籍名录公布为契机,锚定“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古籍文化遗产的目标,推进多项重点工作,推动全区古籍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更加坚实的文化力量。

王瑾雯 周仕兴

## 古籍保护,从“救回来”到“活起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日前迎来标志性成果——100部古籍成功入选《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其中汉文古籍83部、古壮字古籍15部、满文古籍2部。截至目前,广西共有84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72部古籍入选《广西珍贵古籍名录》。

这不仅是数量上的增添,更是一幅记录民族交往、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壮丽历史画卷,正在被精心修复、徐徐展开。

“第四批名录的公布,对广西古籍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广西自治区图书馆馆长甘新介绍,名录的完善,一方面明确了广西古籍保护的核心范围与重点对象,为古籍修复、存藏环境改善、数字化保护等工作提供了精准靶向,推动古籍保护从“全面普查”向“精准施策”转变;另一方面进一步系统梳理了广西古籍的文献脉络,更加完整呈现广西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汇地的文献特色,为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民族融合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广西的古籍传承历史源远流长,自西

汉至清末,其著书史经历了从“他者记述”到“本土发声”的深刻转变;宋元以前寥若晨星,明代本籍著述开始反超,至清代则蔚为大观,在数量与深度上均达顶峰。

其中最富特色的,当属散落于民间的民族古籍瑰宝。在广西,学术界公认的民族古文字便有四种:古壮字、京族喃字、彝族老彝文、水族水书,此外还有瑶、侗、毛南等民族的土俗字。它们常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载体可能是土纱纸、布料,甚至是竹筒。内容从壮族古籍《麽麽塘》的宏大叙事,到毛南族山歌中缠绵的情感吐露;从神秘的仪轨经书,到朴素的契约医方……它们不是图书馆中静默的藏品,而是深深嵌入族群生活与信仰的“活化石”,鲜活地诉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故事。尤其是那些用独特民族文字记录的文献,保存了通用汉字体系未能捕捉的语言细节与文化思维,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不可替代的实证。

然而,抢救这些珍宝的过程充满艰辛。“它们大多仍散藏民间,保存条件堪忧,损毁风险极